

當創造與智慧相遇： 台灣華人文化中 創造力與智慧的關係

楊世英

【作者簡介】

楊世英，美國耶魯大學心理系博士，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Csikszentmihalyi所提出的文化性創造力和智慧的關係。文章首先透過文獻來定義創造力及智慧，就各家智慧理論作一分類呈現，並根據文獻逐一探討創造力與智慧的關係。其後從智慧為生命現象的角度來分析個體在進行文化性創造力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智慧，並以智慧展現歷程中的四大面向（即整合、美好生活之願景、實踐、於人於己的正面影響），就現有之理論和兩個初探性之研究結果來檢視文化性創造力和智慧之不同之處。文章結論指出創造力和能增進人類生活的智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各自追求不同之願景，而在願景實行後於人於己所帶來的效果也有所不同。文章最後透過文化性創造力和智慧之間的比對來檢視廣為接受的「創造力越多，人類生活越美滿」之命題。

關鍵詞彙：智慧、創造力、台灣華人文化、科技領域創造力、美好生活

Creativity and Wisdom

Shih-ying Yang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creativity has been inconclusive; theories foretell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Hence,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dom and Csikszentmihalyi's big-C creativity, a construct whose definition is broad enough to allow substanti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In this paper,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ories of wisdom was conducted, followed 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isdom and creativit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ories of creativity and wisdom.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the author further explo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wisdom, defined as specific kind of life phenomena, and creativity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Creativity with four core elements of wisdom (i.e., integration, vision for good life, embodiment, and positive effects to self and others). The analysis was further consolidated by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two preliminary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s of scientific creativity on graduate students and creative processes reported by Taiwanese Chinese scientists.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wisdom and creativity are two different constructs; their differences result mainly from different visions of the wise and the creative, and the resulting effects of their embodiment. The premise "the more creativity, the better" was examined at the end.

Key Words: wisdom, creativity, Taiwanese Chinese culture, scientific creativity, good life

面對多元文化百家爭鳴的二十一世紀，智慧與創造力是人類社群進步與文化及生活演進不可或缺的原動力。這兩種能力的培養與研究對台灣這一個必須同時強調族群和諧共存與在國際中優勢立足的生態體系尤有關切其能否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創造力著眼於在個體腦中形成的新穎概念，如何能經過專業同行的鑑定與接受，爾後成為普遍知識的一部分這一整體循環中的種種關鍵歷程；創造力的發展因而關係著知識體系、文化與文明的進步。智慧則研究人類如何將互相衝突的事物（如概念、利益、歷史觀點）做平衡有結構性的整合，再將整合的願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並使所實行的事物發揮正面的影響力而達到共善的一系列特殊的生命現象；所以，智慧的培養能促進人類全體的美好生活。

一、智慧與創造力之間的關係

創造力與智慧之間的關係雖在過去有文章探討，然而近年來因為新的創造力與智慧的理論的推出，因此本文就Csikszentmihalyi的創造力理論與智慧理論就其間的關係做一探討。

（一）創造力（Creativity）

1. 在日常生活中所觀察到的各種創造力

似乎在我們身邊偶爾會出現一些有與眾不同觀點、或常常有一些新奇點子的人；這些人我們總是覺得他們很有創意。除此以外，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一些精巧的設計，如新設計的台北火車站、筆記型電腦、3 M自黏便條紙、珍珠奶茶等，當我們的生活因這些精巧的設計發明而便利不少之際，我們也不禁讚嘆這些設計本身就是人類創造力的展現。而當我們把眼光放遠而縱觀歷史時，我們還發現有一些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當他/她們把思維訴諸符號表達出來時，整個改變了當時人們對世界某一部分的看法；換句話說，他/她們的作品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worldview）（Kuhn, 1962）。例如，在孔子之前即有儒，但孔子高舉「仁」並充實這個概念，因而改變了整個儒家二千五百年來的精神內涵與中心思想（勞思光，1984；de Bary, 1988）。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使得生物界分類系統得以統合，進而促成以後生物學及生命科學的發展（Gruber & Wallace, 2001）。或許這些文明的墊腳石經過幾代之後的應用被認為是需要修正或是被新的理論觀點取代，然而在文化演進上它們的存在對催生新思想有不可抹滅的貢獻。這些具有龐大影響力的思想結晶也是人類創造力的一部分。

2.各家理論解析創造力所採取的觀點

西方心理學者針對創造力所提出的理論與定義似乎也因每位心理學者對上述諸現象之偏重不同而有所不同。有些心理學家將創造力定義為屬於個人的人格特質或存在於個人內在的能力，而擁有這些特質與能力的人比一般人更具有創造力（Amabile, 2001; Guilford, 1950; Gruber & Wallace, 2001; Martindale, 2001; Plucker & Renzulli, 1999; Runco & Sakamoto, 1999; Torrance, 1988; Ward, 2001）。有些心理學者則主張創造力是個體所創造出來作品來定義；個體只有在創作出既新穎（novel）又合宜（appropriate）的作品之後，才能被稱為是一個有創造力的人（Sternberg & Lubart, 1999）。近年來心理學對創造力的定義逐漸傾向於將其認定為是個體內在的創意與外在環境中符號與知識諸體系互動之下的產物（Gardner, 1993; Simonton, 1990, 2000），其中Csikszentmihalyi（1988, 1996）指出真正創造力研究應探討的問題不是「創造力是什麼？」（What is creativity?）而應是「哪裡才有創造力？」（Where is Creativity?）。這個說法提出之後，整個地轉移了心理學界研究創造力的焦點。創造力的研究從以前的著重於研究個人的特質，轉而更擴大於研究個體創意與環境和知識體系間的互動。Csikszentmihalyi並主張創造力可依其影響力之大小分為對文化具有擴展作用及影響力之「文化性創造力」（大C創造力，Creativity）以及「一般性的創意」（小c創造力，creativity）。其中文化性之創造力主要指的是在個體腦中所浮現之創意點子，經專業同行（field）的鑑定與揀選之後，在納入某一特定之知識領域（domain）而對文化產生整體性的影響力。至於其它不經過專業同行鑑定且影響範圍幅度較小的點子，稱之為一般性創意。因為Csikszentmihalyi所提的文化性之創造力所牽涉的範圍較廣，與智慧理論中所談論的智慧較為接近，因此本文以探討文化性創造力為主。

3.文化性創造力的影響範圍

就文化性的創造力的定義來看，創造力並不單單的存在於個體之內，而是存在於個體、專業領域與知識體系三者之間。判斷創造力存在與否的主要關鍵在於作品（product）本身的與既有知識之間的「邏輯落差」（logical gap）有多大（Polanyi, 1958），以及個體創意是否在經同行接受之後，最終能在知識領域上發揮足夠的影響力，或因改人類對世界的看法而使得既有的知識往前更推進一步。評量作品所產生的

影響力因牽涉到不同系統的價值觀，所以對於作品是否真正具有創造力，也往往因為每個時代所持的價值觀不同而有所不同。

(二) 智慧

1. 智慧的重要性

面對「智慧」，很少人會質疑它的重要性。然而，因為智慧這個概念在日常生活被廣泛地被運用，因此在定義上難以精準地界定；心理學界一直到近年來對人類智能更深入地探究之後，對智慧的討論才逐漸地熱絡起來。到目前為止，雖然心理學家對智慧的定義仍然眾說紛紜，但是大多認為智慧是追求美好生活，提升生命品質，增進文化與文明不可或缺的元素（Assmann, 1994; Holliday & Chandler, 1986; Kekes, 1983）。

光是有聰明及創意或許仍然不足以使人擁有美滿的人生。心理學家們回顧傳統智力理論發展的過程，才逐漸明白那些曾在智力或創意測驗上叱吒風雲的悍將，並不全然如一般人所預期地，能將其過人的腦力適當地用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增長自己的過程中，或是助益他人。智商極高的資優生很有可能在後半生沒有太大的成就；有些入學考試中的榜首並無法成功地從知識消費者轉變成傑出的知識生產者（Sternberg, 1996）；有些人雖具有超人一等的才華，卻因不能妥善處理生命中的人、事、物，而落得一生悲涼，甚而早逝。反觀之，一些真正對世界有所貢獻的人，如德瑞莎修女，似乎並沒有傲人的智力商數或是創意成績（Chawla, 1992）。

因為上述的發現，近年來探討人類才智的學者也多把焦點轉往對人生事件的處理上。Howard Gardner（1999）的個人智能（personal intelligences）與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Peter Salovey與John Mayer（1990）的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Nancy Cantor與John Kihlstrom（1987）的社會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以及Robert Sternberg（1985）的實用智能（practical intelligence）都是明顯的例子。然而，根據這些學者的研究發現，人類的聰明才智在運用至極時，雖能大大地增進個體的生存能力（adaptability），卻不一定於他人、社會有益（Gardner, 1999）。凡此總總，都促使我們再度深思人類聰明才智的極限與在日常生活中展現智慧的重要性。

2. 「智慧」是什麼？

智慧（wisdom）在西方哲學從蘇格拉底以來一直被討論。自從心理學於十九世紀末

期從哲學獨立出來之後，或許是因為行為學派以及智力測驗與IQ觀念的倡行，「智慧」此一概念在1970年代以前只約略出現於Eric Erikson（1968）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在1984年之後因研究老人智能發展研究而漸受矚目，在1990年代後期又因正向心理學被鼓吹而更受重視（Baltes & Kunzmann, 2003; Baltes & Staudinger, 2000），目前各家理論蜂出競作，各自主張以不同的方法來研究智慧。大體而言，心理學探討智慧的文獻大約可就其對智慧所下的定義分為四類：（1）智慧為個人特質或行為特徵；（2）智慧為人類發展正向的結果；（3）智慧為重要生命知識之專精；（4）智慧為包含一系列歷程且能發揮正向影響力的生命現象。

（1）智慧為個人特質、行為特徵或表現出來的能力

許多智慧研究者將焦點放在智慧者所具有的特質上（Clayton & Birren, 1980; Holiday & Chandler, 1986; Sternberg, 1985; Yang, 2001），他們透過調查一般人認為智者身上所具應有的人格特質或行為特徵來研究智慧這個概念。換句話說這些研究者是透過一般人對智慧所持的「隱性理論」（implicit theories）來研究在某一文化中「智慧」這個概念是如何被界定的。

大體而言，這些研究結果顯示一般人對智者的描述包括了相關的能力與人格特質。其中有智慧的人往往被認為具有下列的能力，如：博學有才幹、具有一般能力、有推理能力、溝通技巧、人際技巧、對日常經驗有卓越的理解力、能從環境與他人的想法中學習、有好的判斷、以及能善用所擁有的資訊等。而智者所擁有的人格特質則有：仁慈有愛心、開明有深度、謙虛不囂張、以及其它整合認知、情意、反思三方面的特質。

在定義智慧為個體的能力或是人格特質的理論中，學者Clyton（1982）強調智慧是一種掌握變化萬千又時有矛盾的人性之能力。Holliday和Chandler（1986）在對加拿大人進行調查之後，主張「智慧」是個體統整了Habermas所提出的技術、實用、解放等知識旨趣（technical, practical, and emancipatory knowledge interests）而表現出的才幹（competencies）。Meacham（1983）則認為「智慧」是個體平衡了「知」與「疑」（knowing and doubting）之後所發展出的一種成熟的態度。

（2）智慧為人類發展正向的結果

另一些心理學家則認為智慧是個體在發展歷程中所產生之正向結果。其中Erikson從個體心理與社會發展層面來強調「智慧」是個體在成功地發展過八個人生階段之後所出現的自我強度（ego strength）；智慧被描述為「面對死亡時對生命本身所表現的既深切又抽離的關懷」（“informed and detached concern with life itself in the face of death itself”）（1982, p. 61）。另外的一些新皮雅傑派的發展心理學家則認為智慧是基於在形式運思期階段之後出現之新的認知結構才能有的思考產物。其中Arlin（1990）主張智慧與發現問題（problem-finding）能力有關。也有學者認為智慧的產生必須要以辯證式的思考作為基礎（Clayton & Birren, 1980）。

（3）智慧為生命重要知識之專精

然而，西方心理學界對「智慧」的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才算真正起步。從1980年代中期，研究成人晚期智能發展的心理學家Paul Baltes和他的同事開始把注意力轉到「智慧」，主張它是成人晚期可能發展出的認知功能。Paul Baltes等人對智慧最主要的論點是：智慧是個體運用晶體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而達成的對「基礎生命實用知識」之精鍊（expertise in the fundamental pragmatics of life）。他們主張智慧通常會被表現在「生命規劃」（life planning）、「生活管理」（life management）與「人生回顧」（life review）上。一個有智慧的人，除了擁有過人的事實與程序的知識體系（factual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systems）之外，他/她在面對世事時也會自然地考慮到生命本身的多變不定（uncertainty）與個體所處之情境（life-span contextualism），進而以相對性的價值觀（relativism）來做成判斷（Baltes, Dittmann-Kohli, & Dixon, 1984; Baltes & Smith, 1990; Baltes & Staudinger, 2000）。

在柏林的實驗室中，Baltes和他的研究群將一些由一個假想人物所面對的與生命規劃、生活管理、或人生回顧有關的難題呈現給研究參與者，請他/她們將整個思考解決問題的過程大聲地說出（thinking aloud）。Baltes和他的研究群選用的難題中，有關規劃生命的例子為：「現年三十三歲的伊莉莎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努力了八年之後有了升遷的機會，而新的工作將帶來更多的付出與更大的責任。但是伊莉莎白和她丈夫也想要在適當的時期生小孩。請依據伊莉莎白

的狀況，規劃一個她三年至五年內可行的人生計畫」（譯自Smith, Dixon, Baltes, 1989, p. 320）。典型的「回顧人生」的難題如下：「年老的瑪莎在人生曾為了家庭而放棄在職場上叱吒的機會。在她的孩子都已長大離家後的一天，她遇到了久未謀面的一位曾為了選擇工作而不結婚的朋友。這位朋友已經退休了，但這次的相遇使瑪莎反思她的一生。她的人生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呢？她對自己的人生會有什麼樣的評價與解釋呢？」（譯自Staudinger, Smith, & Baltes, 1992, p. 275）。至於存在性的「管理生活」的困局則為：「一天某個人接到了一個好朋友的來電，說他/她再也撐不下去了並且決定要自殺。這個接電話的人應該怎麼做或者是考慮些什麼呢？」（譯自Baltes, Staudinger, Maercker, & Smith, 1995, p. 159）

所得的資料經過受過訓練的評分員依據Baltes等人所定義的前述智慧五項標準來評判，即1. 廣泛的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2. 豐富的程序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3. 生命本身的多變不定（uncertainty）的知識；4. 個體所可能面對不同生命情境（life-span contextualism）的知識；以及5. 相對性的價值觀（relativism）的知識。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十幾年的研究所得之對智慧的分數大致偏低，即使是經過新聞記者提名的具有智慧的人，其所得的分數也只有在平均值四左右。一般而言，Baltes研究群的實驗情境越接近實際狀況（如：讓研究參與者與所信賴的人在答題之前討論，再在討論之後經反思來作答），往往得分也越高（Staudinger & Baltes, 1996）。

（4）智慧為一系列的歷程所組成且能發揮正向影響力的特殊生命現象

上述的各家理論對智慧的定義多著重於個體的人格特質、認知發展或知識上。然而，亦有一些學者對「智慧」提出較為廣泛的定義，認為智慧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範疇並不限於個體以內。對於這些學者而言，雖然智慧起源自個體的心思意念，但是智慧現象的完成還必須包含了將思維付諸實現的行動，以及其後所帶來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智慧似乎是一系列的歷程所組成且能發揮正向影響力的特殊生命現象；這個生命現象的產生與否必須靠個體以及其他承受個體行為後果的相關人士來斷定。

其中Robert Sternberg（1998, 2001）提出智慧的平衡理論（A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他提議「智慧」是運用實用智能 (practical intelligence) 與創意 (creativity)，在平衡了個體內 (intrapersonal)、個體間 (interpersonal)、及個體外 (extrapersonal) 的利益 (interests) 之後而達成共善 (common good)。而Yang (2001, 2005) 則將智慧定義為由一系列歷程所組成的特殊生命現象 (life phenomenon)；在日常生活中，智慧起始於個體在思考上統整了一般認為無關或甚至相互衝突的想法，進而形成了能對人類美好生活有所增進的願景，經由具體實踐後，為個體本身和承受個體行為後果的周遭他人帶來正面的影響。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智慧並不易見，然而在邏輯上每個人都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展現智慧。

(三) 創造力和智慧的關係

創造力和智慧的關係，往往因學者對創造力和智慧所持定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結論。

1. 線性關係：負相關或正相關

Sternberg (1985, 1989) 調查一般人對智慧、聰明、創造力的看法，結果發現一般人認為智慧與創造力的關係遠低於創造力與聰明、智慧與聰明之間的關係。他因此提出創造力主要用的是辯證思考中的「反」 (antithesis)，而在智慧中則強調「合」 (synthesis)。Simonton (1990) 以個人特質來定義創造力與智慧，認為這兩者的關係依專業領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就一般的專業領域而言，智慧的發展是有損於創造力的產生；所以在一般的情況下這兩者在個體內的發展是以相反的方向進行，換句話來說是智慧越老越多，而創造力越老越少。但若是將智慧定義為隱性的體驗知識而創造力定義為新穎且合宜的點子，在某些需要人生經驗的專業上，如哲學、歷史、作曲等，個體透過反思所得的人生智慧往往是有助於創造力的表現；因此在這些與人生歷練有關的專業領域中，智慧的發展有助於創造力的產生。

Erikson在其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中雖然對於創造力並沒有多加著墨，然而他認為在人生最後階段所出現的智慧必須是在個體成功的解決了其他階段的發展危機之後才有可能產生的。因為與生產力與創意 (procreativity, productivity, creativity) 有關的第七階段緊鄰著產生智慧的第八階段。依此推斷，似乎對Erikson而言，智慧中包含著創意，而創意為智慧之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Erikson, 1982)。Arlin (1990) 更指出「問題發現」 (problem-finding) 這個跟創造力密不可分的思考元素也是智慧發展的要件

之一。無獨有偶地，Staudinger、Lopez與Baltes（1997）等人發現在實驗室的智慧研究中表現較好的人往往也在創意測驗上有較高的得分。她們因此認為個體的創意是能促進智慧表現的個人因素（Baltes & Staudinger, 2000）。Sternberg（2001）在其新提出的智慧平衡理論中更強調智慧是運用智能（intelligence）和創意（creativity）的結果。

2. 不相關？或者是錯綜複雜的關係？

從智慧為生命現象的這個角度來看，正如文化性創造力一般，兩者的產生和作用都並不侷限於個體之內，而是包含了非常廣泛的思考、願景、行為和正面的效果。單獨個別來看，並沒有哪一個思考、行為、效果本身是一定具有創造力或是智慧的；創造力和智慧都必須靠一系列緊密相扣連的歷程才能產生。一個被認為有創造力或是有智慧的想法或作為，用在不同的情境下，並不一定會具有同等的功能。許多因素或許可以促使我們更有效與頻繁地產生創造力或是智慧，然而這些因素本身並不是創造力或是智慧。然而即使這兩者有以上之相同處，它們在定義上有一個決定性的基本差異：創造力的產生是個體的創意透過符號體系（symbol systems）所表達出來的作品（product），其能改變一般人對世界的理解與看法而將知識領域更往前推進；相形之下，智慧是個體將統整後的願景透過行為實踐，進而對自己或他人的美好生活有所增益。換句話說，創造力必須憑藉著符號化的作品來表現，智慧則是透過日常生活行為具體而微地展現；創造力的作用在於促進知識領域的演進，智慧的作用則在於增益人類美好生活。

然而什麼是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呢？一般談到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的文獻多半集中在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及幸福感（well-being）的調查與研究。其中生活滿意度多以個體主觀感受其各層面的生活狀況來衡量；而幸福感則多以個體是否完成自訂的目標與當時對自我的評價來評定（Ardelt, 1997; Diener, 1984）。然而Cheung（1997）認為除了這兩者以外，人類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可以依理論分成四種型態：享樂主義（hedonism）、辯證主義（dialecticism）、人本主義（humanism）、與形式主義（formalism）之美好生活。享樂式的美好生活追求滿足個體短暫時間內愉快的感受；辯證式的美好生活則講求透過不斷溝通與協調而達成個體與他人之間得最大共善；對追求人本主義式美好生活的人而言，人類潛能發揮與自我實現之後而獲得自

主與尊嚴才算真正達到理想的生活境界。最後，強調美好生活的形式主義者主張在人生中必須完成面對宇宙萬物時的道德與義務上的圓融（Port, 1988）。由此觀之，個體透過智慧所要達成之美好生活，除了個體本身要能在短時間內經歷一定程度的愉悅感之外，就長期而言，個體也必須能發揮其所長以及兼顧與他人之間關係的維持，最終更要能在面對人類整體社群之際，無愧地覺得自己圓滿地完成在生命中所應負的義務與道德責任。

不可否認的是在某些情況下在智慧展現的過程中也會併發創造力，這尤其是當個體對美好生活的願景在符號化之後整個提升了人們對美好世界的理解，而其實踐願景的舉動也為自己 and 他人帶來正面的影響。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展現智慧的過程卻不盡然皆能產生創造力：往往智慧展現的過程中不一定會產生符號化的作品，或是產生的作品本身不必然能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而將既有知識領域往前推進一步。然而創造力和智慧間的關係還可以從文化性創作者在其維持和經營創造力的過程中可能展現的智慧這個層面來探討。

二、個體在進行文化性創造力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智慧

從智慧這種特殊的生命現象來看文化性創造力，我們不禁要問：是否富文化性創造者在致力於發揮創造力的過程中也能展現智慧？如果創造力產生的過程也是智慧展現的過程，那麼透過創造力而展現的智慧其特殊型態為何？

（一）統整

從智慧為由一系列歷程所組成的特殊生命現象（life phenomenon）這個定義來看，智慧起始於個體在思考上統整了一般認為無關或甚至相互衝突的想法，進而形成了能對人類美好生活能有所增進的願景，在具體實踐後，為個體本身和承受個體行為後果的周遭他人帶來正面的影響。而有關創造力的研究則發現：產生文化性創造力的創意點子往往本身都具有統合的特性，不但富文化性創造者在創作的過程中必須整合不同的運思模式（modes of operations）來產生具有創意的想法（Csikszentmihalyi & Rathunde, 1998; Yang & Csikszentmihalyi, 2003），而這些點子也往往整合了不同領域的知識（Csikszentmihalyi, 1996）。

（二）願景

然而文化性創造力與智慧兩者在產生過程中不同的是：文化性創造力中所產生的創意點子不盡然與促進人類美好生活願景有關。雖然這些創意點子在應用之後也可能改善人類生活，然而往往創意點子在其形成之初期要達成的目的不必然是要增進人類美好生活。也因此，只有在某些與人類美好生活有關領域中所產生的文化性創造力，特別是其創意的點子本身即為能促進人類美好生活的願景時，文化性的創造力才與智慧的展現產生關聯。

（三）實踐

文化性創造力產生的過程往往非常的耗費精力與時間；研究發現文化性的創造者幾乎每天必須要工作12小時以上，持續長達十年左右才能產生一個突破性的作品（Gardner, 1993）。在這個過程中文化性創作者必須探索種種可能的方法來將其統合出的創意點子具體呈現或付諸實行。因為創意點子本身的新穎與奇特，所以在實行的過程中往往必須克服許多的困難和障礙，也必須靠極大的毅力來撐過多重的反對和拒絕。在實行的過程中，或許因為沒有人曾經嘗試過類似的做法，或因來自多方強大的討伐聲浪，往往在重大的壓力之下文化性創作者也不可避免地會做出錯誤的判斷，所以在實行中，也包含了在犯錯之後重新振作並改過（Yang & Csikszentmihalyi, 2003）。然而，智慧並不是只是將新穎的想法透過符號具體呈現；智慧的展現必須要將所整合的願景落實於生活中。因此只有在增進美好生活的創意願景於生活中確實被實行時，文化性創造力才與智慧展現發生關聯。

（四）創作所帶來的影響

從現有的研究結果得知，文化性創造力的創作過程往往對創作者本身或是周遭他人會同時帶來正面和負面的影響；而智慧的展現似乎只為個體及他人帶來正面的影響，而較不包含強烈的負面後果。

1. 正面的影響

從對創作者本身的正面的影響來說，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創作者本身往往會因為必要的多方探索而得到許多寶貴的隱性體驗知識（tacit knowledge），而創作者在投諸心力從事與自己能力相符的工作中可以經歷到類似高峰經驗的心流（flow），而這種心流經驗本身即為愉悅感的重要來源之一（Csikszentmihalyi, 1990）。在創作的作品被同行所接納之後，創作者往往有機會與其他學有專精之士有更深入及密切的交往，也較

以前更能選擇從事合乎自己興趣的工作（Gardner, 1993），進而在人際互動上或是工作中獲得更多的心流經驗。在其創作作品發揮文化性的影響力之後，創作者往往因圓滿完成面對生命中自定的「人生志業」與「任務」（Csikszentmihalyi, 1996; Gardner, 1993）等目標而自我評價提升，幸福感也在自尊、成就感、與自我實現的滿足之後變高（陸洛，1998; Lu & Shih, 1997）。在達成文化性的創造力之後，創作者也往往獲得從外界來的尊敬與賞酬（Amabile, 2001; Martindale, 2001）。就其為社群所帶來的正面影響而言，文化性創造力所發揮最顯著的影響即為其能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和拓寬舊有的知識領域。在完成文化性創造力之後，創造者對後起的學習者而言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色典範（role model）（Nakamura & Csikszentmihalyi, 2001），創作者身旁的人也往往倍染金光，家族的成員更可能因此而覺得與有榮焉而家門光耀。

2. 負面的影響

從創作中可能有的負面的影響來看，要達成文化性的創造力個體與社群也必須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首先，就創作者本身而言，十年以上長時間的投入工作對身體與心理而言都造成沈重的壓力。這樣大量的工作量與心血的投入，或許因為創作者本身精力充沛，或是因為創作者要應付長時期過度工作而養成運動或靜默休息的養生習慣而不覺疲憊（Csikszentmihalyi, 1996）。然而，從進化知識論（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的觀點來分析，文化中所生產的創意往往要通過大量自然選擇與淘汰才能存留於知識體系之中（Campbell, 1974），因此個人與社會在經濟上與腦力上的投資往往與所得的賞酬比例懸殊。現今社會為了要培養創新人才，在經濟上與政策上也往往要做出相當龐大的投資（OECD, <http://www.oecd.fr>）。就舉發明小型錄影機8來說，根據原創作者的說法，第一個模型被製造時每一個零件都必須由手工打造，因此造價高達數千美元，一旦經過領域揀選而大量製造時，造價則突降數十倍。姑且不論像這般在原初材料與造價成本懸殊的差異，創造者本身腦力與時間的大量投入也常常因為創意點子不被看好，而使得創作初始的投資血本無歸（Yang & Csikszentmihalyi, 2003）。由於文化性的創造力必須經過同行及專家間一番選擇，因此個體及社群針對培養創造力所做的諸多投資也可能因創意點子的淘汰，而使得個體與社群的大量金錢、精力、心神、與資源都因無法回收而耗費。

除此以外，在人際關係上，尤其是與家人相處間，文化性創造者很有可能因工作時間

的過長而有所犧牲。Gardner (1993) 所研究的七位文化性創造者（弗洛伊德、畢卡索、愛因斯坦、艾略特、史特拉汶斯基、葛蘭姆、甘地）似乎無一倖免地為了一生志業而在人際關係上有所缺憾。這些缺憾也許是在求學的過程中因富創造力的個體堅持自己一套看法而與老師多有衝突；或與出道的同儕因自身歧異的想法而處在社交邊緣的角落；在與親人與好友相處上，這七位改變二十世紀文化的創造者也往往乏善可陳。弗洛伊德因為堅持己見而與早期弟子兼好友的容格（Jung）、阿德勒（Adler）等決裂；愛因斯坦與畢卡索的孩子終其一生與其維持敵對與仇視的態度。富文化性的創造者有可能因傾向於選擇投注自己才能，而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做出所謂的犧牲自己與他人關係的「浮士德式的交易」（Gardner, 1993）。然而，並不是所有投入文化性創作者的家庭生活與人際關係都注定如此悲涼，另有研究顯示有些文化性創造者能獲得周遭他人對其創作的支持或特殊工作型態的諒解，而能在家庭與創作之間取得一個良好平衡（Csikszentmihalyi, 1996; Yang & Csikszentmihalyi, 2003）。

（五）小結

雖然智慧展現的過程中也可能包含了個體為實現美好生活的願景而努力投入以及多方奔走，然而似乎智慧展現的歷程，其中很大的特色是個體的行動沒有附帶產生許多強烈負面結果（Yang, 2001）。或許有些人為了實現自己心目中遠大的願景而不擇手段，可能當其願景在實現之後也確實為個體本身與周遭他人帶來益處。然而這樣的歷程對一般人而言並不是智慧的展現，這對那些在過程中承受不幸的人尤其是如此。就如同希特勒在一次世界戰之後以新異的方式在短時間整合德國，其願景的實踐對於希特勒自己以及當時對國家喪失信心的德國人來說並不是完全沒有益處的，然而這樣的一個願景即使是在大張旗鼓地被實踐之後，因為其中產生的強烈負面結果與所製造的多重不幸，其所展現的生命現象迄今仍然不被人認為與智慧有任何的關聯。

綜上觀之，個體在進行文化性創造力過程中，同時展現智慧似乎只有在下列特殊的條件下才可能發生：文化性創作者其作品本身即為統整且能對人類美好生活有所增進的願景，而其在實踐的過程中，創作者不但能維持自身在身體與心理上的健康，在人際互動中亦能與周遭他人調和或在工作完成與人際相處上取得平衡及諒解，在達成文化性創造力之後，其作品能為自己和他人帶來正面的影響。

三、台灣華入文化中文化性創造力與智慧的關係

(一) 台灣華入在文化性創造力的產生上與西方可能不同之處

台灣華入之文化性創造力與西方人可能之差異大致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創作的個體因文化傳承而在心理特性上之不同，另一個則是文化性創造力產生的環境有其差異。

1. 心理特性上之不同

心理學研究顯示台灣華入因所承受的社群文化與西方不同（Bond, 1996; Yang, 1981; 黃光國，1995），而用以評判生活滿意度的標準及對所追求的美好生活也有所不同（Suh, Diener, Oishi, & Triandis, 1998; Lu & Shih, 1997; 陸洛，1998）。這些相異之處或許為文化性創造力的產生上帶來不同的挑戰與祝福。心理學研究顯示台灣華入重和諧（黃曬莉，1999）、講關係（Hwang, 2000）、遵從人際之間的位階關係（鄭伯燾，1995）、有著極濃的社會傾向（楊國樞，1992）。相對於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人而言，台灣華入的自我概念是以情感及關係的範圍為界線，而不是以身體的範圍為界線（Markus & Kitayama, 1991; Triandis, 1995）。換句話說，台灣華入的自我分際並不是完全截然劃分，人我之間因所處情境不同而有多重層次的滲透性（Hsu, 1953）。或許因為過去華夏文化在其所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之上，發展出精耕農業、家族共產、父系傳承，與強調階序的社會與人際之結構，相較於其他成長於個人主義文化下的西方人，台灣華入比較傾向與環境融合而不是與自然獨立抗衡的適應方式。在心理與行為上台灣華入顯現出較多重視順從、依賴權威、以及對違反既定行為規範的「不和焦慮」和「衝突恐懼」。在人際互動中台灣華入對他人的意見、標準、褒貶特別敏感，除了心理上希望因獲得他人的贊同而留下好印象，在行為上也努力與別人一致以避免他人的譏笑與批評（楊國樞，1992）。對華入而言，在人際間維持和諧的關係是生活滿意度中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Kwan, Bond, & Singelis, 1997）；而針對台灣華入所做的幸福感調查研究也顯示「社會支持」是影響台灣華入的幸福中一個主要的因素，而「人際關係的和諧」也是台灣華入幸福感非常重要面向之一（陸洛，1998）。Nevis（1983）甚至斷言對於華入而言，歸屬感的需求是比生理和安全的需求更為基本而切乎個體生存的需求。

在「合群是至高美德」的前提下，個體似乎較不易在心態上脫離所屬的社群而在思考

上進行批判、強調獨創。一旦有了與眾不同的想法，個體也可能因為具有「去異求同」的文化習性而產生社會焦慮，進而壓抑自我的創造力（邱浩政，2002）。在「尚同」的教化與訓練過程之後，面對他人的與眾不同也因而產生極大之焦慮感，因而整個文化形成一種在有形或無形之中，自然去批評或壓抑別人之異見異行的社會壓力（楊國樞，1992）。

2. 文化性創造力產生的環境上之差異

其次，從產生文化性創造力的環境來說，台灣在知識權力結構中處於邊陲的地位，在許多知識領域上因發展程度不夠而仍處於受其他文化產品「殖民」的狀態（黃光國，2002）。因此，在台灣華人之創作要經過專業同行之揀選，然後變成普遍知識體系的一部分，進而拓寬知識領域實屬不易。但是台灣在國際知識創新與發明的權力結構中擁有的「後進國的優勢」，一旦富創造力的作品被揀選，領域中的新知識傳遞卻較為容易。

就客觀的生活條件而言，台灣地狹人稠，在經濟上不如幾個掌握知識權力中心的大國來得富裕。在這樣的地理與物質情況下發展出來的創作社群，或許因為互動較為緊密而無法提供創作個體較大獨處的心理空間來培養與體會創作中重要的心流經驗。反而觀之，由於台灣華人社群互動緊密，因此在創造的過程中與同行溝通與交換意見較為容易，或許也因此在同一專業中的守門人（gate-keepers）彼此對作品是否具有創造力較易達成共識。

然而，若是從創作者所處的人際環境的角度來思考，值得玩味的是，台灣華人社群中也可能因為強調和諧，而對已經立身為社群中之異議份子或許會為了維持表面和諧而給予較高的容忍。或許正由於台灣華人社群較西方偏重個人主義的文化更重和諧、講關係，文化性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即使因持異議而處在社會邊陲的角落，其所處之家族或所處社群為維持表面和諧，或許仍然提供一定程度的人際互動而不至於使創作者完全孤立。或者，文化性創作者若本身在提出特異創見之前已經成為某一知識領域之權威，則其創見將有可能較不會受到各方之譏評。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佐證的現象為：台灣華人社群有正向的年齡歧視（positive ageism）（Palmore, 1993），針對台灣華人幸福感的研究結果顯示年齡愈大，快樂程度也越大（陸洛，1998）。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推論在台灣華人的文化中，不論個體持異議或創見與否，社群對年齡較長者皆

給予較多的尊重與禮遇，也給予資歷較深者在人際互動中較多的表達意見的機會。或許這樣一個尊重長者的社群文化從一方面來說，無形中鼓勵世代間的互動而促進經驗與意見的交換；另一方面相較於其他對年長者存有負面年齡歧視的國家，台灣華人社群提供年長或資深的文化創作者較好的互動情境與人際空間（例如，使其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並瞭解不同世代及其思考模式等）來發揮潛能。

3. 小結

在上述的心理傾向與社群條件之下，似乎在文化性創造力產生的過程初期中最容易磨損的「人際和諧」也是台灣華人在其美好生活願景中最為渴求且戀戀不能捨的部分。在這樣一個看似衝突且不利於文化性創造力產生的情況下，台灣華人創作生態可能所培養出具有下列三種特性之一的文化性創作者：（1）台灣華人文化中的創作者可能要付出較西方之創作者更高的情緒成本才能產生文化性的創造力，因此在身心上較西方之創作者更容易產生枯竭與耗盡。（2）在台灣華人文化所培養出的富文化性創作者可能在「關係和諧」、「去異求同」、「合群」等面向上特別具有抗壓性；相對於其他台灣華人，這些創作者有著與西方創作者類似之低社會取向：對人際關係的要求較低，或是較能容忍人際關係方面的缺憾。（3）相較於西方同樣富文化性創造力的個體，台灣華人文化所培養出的文化性創作者可能本身已經磨練出能夠適當平衡工作與人際關係的能耐：一方面能夠在專業上堅持自己獨到的創見，另一方面又能兼顧人際之間的融合，使別人不因自己不同的看法而倍感威脅，或是在人際關係上製造缺憾。

由上推論，相對於世界上其他文化而言，台灣華人文化因在創作的生態環境上有其特殊的條件，因此也可能培養出不同能耐的富文化性創造者。然而，因創作者的特性之不同，其透過產生文化性創造力而展現智慧的可能性也有所不同。若台灣華人創作者多具有前述第一類的特性，則其透過創作來展現智慧的可能性較他人為低。反之，如果創作者多具有第三類的特性，則相較於其他的台灣華人或是西方富文化性創造力的人而言，這些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是有較高展現智慧的可能性。

（二）台灣華人文化中產生文化性創造力與展現智慧間的關係

綜合以上，細部檢視在台灣華人是否能透過產生文化性創造力的過程來展現的智慧有其必要性。在此透過兩個初探性的研究結果來探討台灣華人文化中產生文化性創造力與展現智

慧間的關係。由於台灣華人的創造力近年來在科技領域有彪炳的表現，因此兩個初探研究以科技領域為主要探討的範圍。其中第一個研究透過後起學者（即科技領域相關科系之研究所碩、博士班學生）所列舉的「改變對其專業領域看法的本土性著作」之調查結果來檢視富文化性創作者對後起學者可能造成的影響。而第二個研究結果則呈現富文化性創作者主觀敘述其創作過程，來檢視台灣華人文化中產生文化性創造力與展現智慧間的關係。

第一個研究：富文化性創作者對後起學者可能造成的影響

透過調查台灣11所大學（包括：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中原大學、東海大學、中興大學、暨南國際大學、中正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之科技相關學院暨研究所（包含電機、電機工程、通訊、機械工程、電力、生物、應用數學、資訊科學、資訊管理、海洋科學、漁業科技、地球科學、心理等13個以上之領域）之碩、博士班研究生，請其列舉在學習專業領域過程中，因研讀而改變其對專業領域看法的本土著作，並說明著作造成觀點改變的原因。所回收249份問卷顯示文化性創作者對後起學者可能造成下列三類的影響：

1. 透過專業著作而發揮的影響

研究生指出（ $n=122$ ，49%）其所接觸到的著作為他們所帶來下列五大類的改變：

（1）使其對專業知識有更深一層的領悟（ $n=55$ ），如：「徹底瞭解此技術的實際理念，打破之前的迷思與膚淺的概念」。（2）對思考方式或研究態度有所啟發（ $n=25$ ），如：「站到既有的框框外來看事情。不是刻意持相反意見，而是真正跳脫原有模式來質疑事件的最根本性與定義，讓我這個一路追尋前人模式唸書的研究生，有突然豁然開朗，就好像重動被突然連結，展現另一個異次元的感覺」。（3）瞭解到新的研究方法或工具的應用（ $n=18$ ），如：「更快速的解決工程及研究上的問題」。（4）對整體的領域知識在廣度上有更清楚的掌握（ $n=14$ ），如：「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給了我更廣闊更一般全面性的瞭解整個海洋生態」。（5）激發其對專業的學習興趣或挑起更進一步的研究動機（ $n=10$ ），如：「想進一步對其觀點加以瞭解及探討」。一般而言，富文化性的創作者透過專業著作，讓後起之學者領悟某些專業概念的重要性，並激發其在學習上的動機，而使得後起之學者覺得其觀點新穎、功力不凡，進而對所專研的知識有更深入與廣泛的瞭解。

2. 無影響

另有91位研究生（37%）指出在其領域中所接觸到且改變其對所就讀領域之觀點的創作者多為外國人，其中並沒有台灣本土的學者。問卷的答案除了註明「沒有」或「無」之外，有的研究生也寫道：「在台灣方面，於這個領域沒有好的創作」，「目前還沒有」，「沒有，因為國外著作相當多並有延伸性」，或是根本註明所心儀的外國學者之姓名或著作，有些研究生直接列出所讀的翻譯作品。

3. 透過教學上或非專業著作而發揮的影響

還有36位研究生（14%）指出使其對所學領域的觀點產生改變的是其專業領域中，表現傑出的人士在教學或是其在非專業方面的著作。這一類被提及的學者並不是因為其在專業上的創作而被列舉，因此並不能將其所發揮的影響力歸論為文化性創造力的一部分。然而，從後起學者的反應中，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富文化性創作者在生活其他面向上可能發揮的影響力。這一類的研究生反應可以粗略地再分為兩類。一些研究生指出他們在專業領域的學習因創作者在教學上教法新穎或觀點特殊而有了革命性的轉變。一般而言，這一類的學者透過教學對後起之學者帶來的影響可分為三大類，其中包括：（1）因為教師知識的傳授而對其領域有更多的了解，如：「對此領域的認識與邏輯推理」。（2）此外也有研究生因為老師教學成功有效，進而對此一專業領域的興趣大增，如：「想要進一步對老師所論述的觀點加以了解及探討」。（3）也有的研究生是因為老師在做學問上的身教深受感動而得到新的思考及安身立命上體悟，如：「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堅持讓idea實現，而不被現實及匡定的架構羈絆；以及人需要將興趣與工作結合」等。

而創作者透過非專業的著作也可以影響後起的學者。從這一類的反應中也可以看出科技領域之研究生在學習科技的過程中，亦嘗試透過非專業著作從同領域的專家身上領受：（1）一個專業人在人類社群中的定位，以及（2）專業知識在應用方面對社會可能有的貢獻；如，「我覺得身為一個將來的工程師，對於本身要發展的科技，應該要以整個社會的觀點來發展，不應該因為某人或某團體的利益來發展，這樣才不失一個工程師該有的道德」，以及「X是學電機的，[我]常以為學科技的都只注重在專業上的專研，而忽略了對人的關懷。但是看了X的文章後完全改變了我的想法，不論科技在怎樣進步，都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活，若忽略了最重要的人，那即使科技再進步都不再重要」。

4. 小結

綜上所述，創作者對後起的學者在追求專業知識上所發揮的影響主要是透過專業著作；往往其專業著作能激發後起的學者學習的動機，而使其專業知能加深加廣。此外，我們也可以推測文化性創作者可能透過教學或是非專業著作，來對後起之學者發揮改變學習態度與支持研究興趣上的影響力，而使得後起的學者在思考方式及尋求社群定位上獲益。

第二個研究：文化性創作者對創作過程的主觀敘述

第二個研究則針對二十位被同行推薦之創作者進行訪問，被同行推薦創作者都在研究上多產且傑出，其中有些因著作大量被引用且引發後續一系列之研究，因此被認定為文化性之創作者。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詢問其在創作最被廣為接受作品時的心路歷程。然而為要保護受訪者之隱私，在此僅以不細列性別、年齡、領域的情況下來呈現其中兩位受訪者的部分陳述，以此一窺創作之心路歷程並與智慧作一比較。

1. 創造力中的統合與願景

與創造力理論和西方研究所得結果相類似的是，訪談者談及其作品時皆提到其中所做的統合；他們或是將既有的問題用別人熟知卻想不到的方法去解決，或是結合兩種方法來更有效地解決已經存在的問題。如：「應該是說我們用一種新的方法去解，這個方法以前沒有人去注意到」。然而，在產生創造力的過程中，創作者在統合想法之後所要達成的目的可能與展現智慧不同。如同一位受訪者談到其願景時說：「當然是有啦！是會有，但那個只是純粹是……，我是覺得是滿狹隘，只是說學術上一種……，嗯～，像我做的東西都是比較屬於……，所謂比較學術理論，比較沒有那個應用性啦！所以做出來的時候只是自己覺得很高興，解決了一個問題，但我從來就不會認為說它有什麼很了不起的應用」。所要達成目的之不同可能是智慧和創造力之間最大差異的來源。

2. 產生創造力過程中的實踐

由於研究的方法是透過訪談，因此較難細部的捕捉訪談者在創作過程中願景的實踐，然而可由訪談者的隻字片語一窺其間的心血投入，如：「在做研究的過程，我想，我的記憶都是說很辛苦，都是苦工」。另一位受訪者道：「不過那個過程是很難過的，因為每天都在想，連作夢都在想，連作夢都想：『奇怪，到底哪裡錯了？』那晚上只

要想到程式可以怎麼寫，就會爬起來寫」。

3. 創作所帶來的影響

從正面的影響來看，訪談者提及透過創作過程為心靈上帶來愉悅感、成就感、以及自我實現的滿足。如：「我本身一開始做這份研究，回歸我當初會做研究的原因，我覺得工作它能夠帶給我一個平靜，這一份工作它帶給我一份平靜；當然，另外一個就是

我可能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我覺得很自負」。另一位創作者表示：

我是覺得可能有一點滿重要的啦！人這一輩子裡面至少要有一次的經驗，就是說你很投入、非常專注的去做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當你把它完成的時候，你會覺得你有成長，你整個那種人生的那種境界會提升。就是你去完成一件你自己覺得比較得意的事情，我覺得人這一輩子至少都要有過一次這樣的經驗。因為在那個過程自己都很辛苦，好像有一點浴火重生那種感覺，我覺得每個人一定要經歷過這樣的經驗。進入那個境界就是說，當你回頭再看的時候哦，你其實你的心情會變得很平靜。

訪談者也提及在創作作品在為同行所接納之後也帶來實質上的益處。如：「頒獎，那我這篇paper被citation的次數滿高的。那我這篇應該是19XX年那一年被引用次數最高的。絕對超過一百次，因為我自己的統計就已經有超過一百次了。寫這一篇的時候，那時候就很興奮哪，就知道說這篇paper的結果會有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很意外、很有興趣，那時候可能就有預感了。總覺得就是說讓自己更有信心哪！嗯，因為有時候就是代表一種別人的肯定嘛」。另一位訪談者被詢問創造力是否為自己帶來益處時則表示：「有，表示穩住了，升等應該比較沒有問題。那把publication量化到了……，變成把創造力量化到了最現實的方向」。

不可否認的，創作者也為長時間的投諸心力於創作上付出一些代價。在這一方面兩位創作者的敘說如下：「體力會比較差啦，絕對會，那拿的是健康在跟人家賭。我覺得physically是會減損的，譬如說過不正常一點的生活，身體會愈來愈差，我大概電腦前工作太久了，頸部痛了很多年」；「我已經壓力夠多了，我是一個容易給自己製造壓力的人」。訪談中兩位受訪者皆表示為將精力投諸在專長領域之上，在與家人相處上頗有犧牲。「我是這樣覺得啦，生活跟研究分不開，因為你什麼時候會想到什麼點子，那把研究當成生活的人很多，可是這樣子的人好像會多少對家庭生活有一點傷害。譬如說，我們可以想到一個點子，瘋狂的做到半夜，但是我們的家人不見得能夠

這樣忍受我們這麼奇怪的個性」；「應該說以前在創作高峰的時候，我都很忽略研究以外的事情，所以那時候人際關係也不是很好。反正那個時候，只要任何影響到我工作的事情，我都把它視為是一種麻煩」。

4. 小結

由嘗試性的訪談內容顯示個體在進行文化性的創作時的確是需要付上代價的，尤其是在健康、心理壓力、家庭生活方面可能會有所犧牲。然而創作的過程也為個體在心理上帶來平靜的感受、成就感以及自我實現的滿足；在創作的作品被認定之後，更可能為個體及社會帶來實質上的益處。

從和智慧相比的角度來看，針對被提名為有智慧者所進行的訪談中，智慧的展現往往也需要克服萬難，然而被提名為有智慧者往往認為自己在做必須要做的正確的事，因此即使在直接被詢問的情況下，其主觀的陳述中也很少透露其在實踐美好生活願景過程中於身心與人際關係上所付出的代價（Yang, 2005）。這或許是因為相對於展現智慧者而言，文化性創造者有決定自己創作方式的選擇，而展現智慧者在實踐其美好生活願景或解決生活上的難題時，往往因為覺得自己身處在必須力挽狂瀾的情況下而義無反顧。就目前對智慧展現所累積的實徵資料中，我們很難判斷是否個體為實踐其美好生活願景奔走時，也會像富文化性創造力者般於身心健康和人際相處有所磨損，然而就目前所收集的訪談資料來看，在台灣華人社群中的文化性創造者和展現智慧者之間最大不同之處是在於兩者對其所持願景上之差異，以及願景實行後帶來的不同影響。

四、結語

今日的台灣在學術及政治上面臨必須在國際舞台上爭取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的挑戰，在經濟上面臨加入WTO之後將過去傳統經濟轉化成以「鼓勵創新、培育人才」為導向的知識經濟之課題（OECD, 1996；高希君，2000）。在教育上為了因應時代需要，不但教育改革中將培養創造力列為十四項教育目標之一（其中第六項為：革新創造能力）（行政院教育部，1998），更有「創造力白皮書」等推動培養創造力教育政策之制訂。這一切的努力似乎都表達一個訊息：「創造力越多，大家生活越美滿、國家越進步！」似乎無形之中大家也都接受這樣一個命題。

然而果真如此？雖然創造力本身可以帶來改變文化及推進文明的好處，然而透過上述文獻並從個體生存的角度來看（Campbell, 1974），我們不難明白它為什麼是這麼難以培養。總體而言，產生文化性創造力和展現能增進人類生活的智慧是不同的兩回事。雖然在智慧展現的過程中需要創意的輔助，然而個體在產生文化性創造力的同時，不盡然能展現智慧；文化性創造者與智慧者各自追求不同的願景，而在實行願景之後於人於己所帶來的效果也有所不同。

從文化及社群的角度來看，我們只有在瞭解創造力和智慧可能對人類生活帶來的影響後，才能設計出有利於創造力與智慧發展的環境，也才能有效地推動培養創造力與智慧的教育政策。

參考文獻

- 行政院教育部（1998）。教育部改革行動方案。台北市：行政院。
- 邱浩政（2002）。「通情」才能「達理」？創造歷程的社會文化影響與人際互動機制之探討。論文宣讀於第四屆華人心理學加學術研討會。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高希君（2000）。知識經濟的核心理念。載於高希君、李成（主編），知識經濟之路（頁1-26）。台北市：天下遠見。
- 陸洛（1998）。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1），115-137。
- 勞思光（1984）。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市：三民書局。
- 黃光國（1995）。知識與行動。台北市：心理。
- 黃光國（2002）。科學哲學與創造力。台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
- 黃囑莉（1999）。人際和諧與衝突。台北市：桂冠。
- 楊國樞（1992）。中國人的互動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載於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論與方法篇。台北市：桂冠。
- 鄭伯燾（1995）。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本土心理學研究，3，142-219。
- Amabile, T. M.（2001）。Beyond Talent: John Irving and the passionate craft of crea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33-336.

- Ardelt, M. (1997). Wisdom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old age.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52B, 15-27.
- Arlin, P. K. (1990). Wisdom: the art of problem finding.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230-24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smann, A. (1994). Wholesome knowledge: Concepts of wisdom in a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12, 187-224.
- Baltes, P. B., & Kunzmann, U. (2003). Wisdom. *Psychology*, 16, 131-133.
- Baltes, P. B., & Smith, J. (1990). Toward a psychology of wisdom and its ontogenesis. 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87-1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ltes, P. B., & Staudinger, U. M. (2000). Wisdom: A metaheuristic (pragmatic) to orchestrate mind and virtue toward Excel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122-136.
- Baltes, P. B., Dittmann-Kohli, F., & Dixon, R. A. (1984).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in adulthood: Toward a dual-process conception and a model of 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In P. B. Baltes & O. G. Brim Jr.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6, pp. 39-7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altes, P. B., Staudinger, U. M., Maercker, A., & Smith, J. (1995). People nominated as wis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Psychology and Aging*, 10 (2), 155-166.
- Bond, M. H. (Ed.), (1996).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D. T. (1974).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In P. A. Schli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pp. 413-463). La Salle, Ill: Open Court.
- Cantor, N., & Kihlstrom, J. F. (1987). *Personality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Chawla, N. (1992). *Mother Teresa*. Boston: Element.
- Cheung, C.-K. (1997). Toward a theoretically based measurement model of the good lif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58, 200-216.
- Clayton, V. P. & Birren, J. E. (1980).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across the life span:

- a re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topic.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3, 103-135.
- Clayton, V. P. (1982). Wisdom and intelligence: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later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5 (4), 315-321.
- Csikszentmihalyi, M. (1988). Society, culture, and person: A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 In R. J. Sternberg (Ed.),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pp. 325-33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New York: Harper & Row.
- Csikszentmihalyi, M. (1996). *Creativity: Flow and the psychology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 Csikszentmihalyi, M., & Rathunde, K.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on the ontogenesis of psychological complexity.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1, 635-684.
- De Bary (1988). *East Asian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iener, E. (1984).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5, 542-575.
- Erikson, E.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Erikson, E. (1982).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Gardner, H. (1993). *Creating mind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ardner, H. (1999). *Intelligence reframed*. New York: Basic Books.
- Gruber, H. E., & Wallace, D. B. (2001). Creative work: The case of Charles Darwi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46-349.
- Guilford, J. P. (1950). Crea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 444-454.
- Holliday, S. G., & Chandler, M. J. (1986). Wisdom: explorations in adult competence. *Contributions to Human Development*, 17.
- Hsu, F. L. K. (1953). Americans and Chinese: *Two ways of life*. New York: Abelard-Schuman.
- Hwang, K. K. (2000). Chinese relationalism. *Journal for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30, 155-178.
- Kekes, J. (1983). Wisdom.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 (3), 277-286.
- Kuhn, T.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wan, V. S. Y., Bond, M. H., & Singelis, T. M. (1997). Pancultural explanations for life

- satisfaction: Adding relational harmony to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1038-1051.
- Lu, L. & Shih, J. B. (1997) . Sources of happines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7, 181-187.
- Markus, H., & Kitayama, S. (1991) . Culture and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253.
- Martindale, C. (2001) . Oscillations and analogies: Thomas Young, MD, FRS, geniu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42-345.
- Meacham, J. A. (1983) . Wisdom and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Knowing that one doesn't know. *Contributions to Human Development*, 8, 111-134. (Karger, Basel) .
- Nakamura, J., & Csikszentmihalyi, M. (2001) . Catalytic creativity: The case of Linus Paul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37-341.
- Nevis, E. C. (1983) . Cultural assumptions and productivit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E. N. Schein (Ed.) , *The art of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pp. 228-244)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ECD (1996) .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Paris: OECD.
- Palmore, E. B. (1993) . *Developments and research on aging: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Plucker, J. A., & Renzulli, J. S. (1999) . Psychometric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human creativity. In. R. J. Sternberg (Ed.) ,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35-61)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lanyi, M. (1958) . *Person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rter, B. F. (1988) . *Reasons for living: A basic ethics*. New York: Macmillan.
- Runco, M. A., & Sakamoto, S. O. (1999) .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creativity. In. R. J. Sternberg (Ed.) ,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62-92)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lovey, P., & Mayer, J. D. (1990)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9, 185-211.
- Simonton, D. K. (1990) . Creativity and wisdom in aging. In J. E. Birren, & K. W. Schaie,

- (Eds.) ,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3rd. ed.) (pp. 320-329)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imonton, D. K. (2000) . Creativity: Cognitive, personal, developmental, and social aspe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151-158.
- Smith, J. Dixon, R. A., & Baltes, P. B. (1989) . Expertise in life planning: A new research approach to investing aspects of wisdom. In M. Commons, J. Snnott, F. Richards, & C. Armon (Eds.) , *Adult Development*, 1 (pp.307-331) . New York: Praeger.
- Staudinger, U. M., & Baltes, P. B. (1996) . Interactive minds: A facilitative setting for wisdom-relate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4) , 746-762.
- Staudinger, U. M., Lopez, D. F., & Baltes, P. B. (1997) . The psychometric location of wisdom-related performance: Intelligence, personality, and mor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3, 1200-1214.
- Staudinger, U. M., Smith, J., & Baltes, P. B. (1992) . Wisdom-related knowledge in a life review task: Age differences and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 *Psychology and Aging*, 7 (2) , 271-281.
- Sternberg, R. J. (1985) .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wisdo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607-627.
- Sternberg, R. J. (1989) . Intelligence, wisdom, and creativity: Their natur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In R. L. Linn (Ed.) , *Intelligence: Measurement,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pp. 119-146) .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Sternberg, R. J. (1990) . Wisdom and its relations t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In R. J. Sternberg (Ed.) ,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p. 142-159)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ernberg, R. J. (1996) . *Successful intelligen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ternberg, R. J. (1998) . A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 347-365.
- Sternberg, R. J. (2001) . What is the common tread of creativity? Its dialectical relation to intelligence and wisdom.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60-362.
- Sternberg, R. J., & Lubart, T. I. (1999) .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Prospects and paradigms. In R.

- 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3-1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h, E., Diener, E., Oishi, S., & Triandis, H. C. (1998). The shifting basis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ements across cultures: Emotions versus nor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482-493.
- Torrance, E. P. (1988).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as manifest in its testing. In R. J. Sternberg (Ed.),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pp. 43-7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iandis, H. C. (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Ward, T. B. (2001). Creative cognitio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and the creative writing of Stephen R. Donalds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 350-354.
- Yang, K. S. (1981). Social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modernit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3, 159-170.
- Yang, S.-Y. (2001). Conceptions of wisdom among Taiwanese Chines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2, 662-680.
- Yang, S.-Y. (2005). Wisdom in real-life contexts. Paper submitted t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Yang, S.-Y., & Csikszentmihalyi, M. (2003年3月). Managing a good life: Lessons of wisdom from later life. 2003創造力實踐歷程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政治大學。